

地整理项目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项目,规范宅基地再利用流程,推进田、路、林、村综合整治,盘活并优化利用农村低效和空闲宅基地。

(作者杜伟,系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黄敏,系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建设“教育强国” 实现伟大复兴

——十九大报告中的教育宣言与未来图景

雷 云

(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与心理学院)

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教育事业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教育强国”这一气势恢弘的论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激动人心的教育宣言,也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令人向往的教育图景。为此,探讨“教育强国”的理论内涵与现实路径,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这一教育宣言的意义,全面把握这一教育图景的架构,顺利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伟大梦想。

一 “教育强国”的提出

“教育强国”是作为新时代教育宣言提出来的,其展开便是一幅美好的教育图景。何谓教育宣言?教育宣言是一个时期教育事业总体规划的简要表达。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①可以看出,党的十九大对教育事业的总体部署是以“教育强国”这一核心论题展开的。新时代教育的改革发展、教育现代化的具体推进、教育制度的创新谋划、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培养、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国民素质的提高等等,不过是“教育强国”这一论题的进一步注解,是“教育强国”所描画的未来图景的具体展显。建设“教育强国”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总纲领、总规划。

教育宣言是具有感染力、号召力、凝聚力的行动纲领。“教育强国”何以具有感染力、号召力与凝聚力?其重要原因在于,十九大报告将建设“教育强国”确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我们知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十九大报告的关键词之一(报告全文提及27次),它被称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肩负起的“历史使命”,而且被认为“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教育强国”作为“基础工程”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其必然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而具有感染力,必然因关乎我党是否能完成“历史使命”而具有号召力,也必然因其描画的美好的教育图景而具有凝聚力。

教育宣言传达着某种教育主张。“教育强国”是对“教育大国”的超越。“教育大国”所描述的是教育在体量、规模、范围等维度上的自在状态,只陈述事实现象而并不表达某种观念和主张。“教育强国”与此颇为不同,首先,它并不是对自在状态的陈述,而是不同国家教育之间的对比,“强弱”需要一个具体的“他者”作参照才有结论;其次,“强弱”也不仅是简单比较,而且是不同国家教育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的判定;再次,“强弱”蕴含着交往和互动的含义,“强”者自然赋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教育强国”这一宣言便传达着如上三层含义:它将认识的背景从自我转向了世界,内含渴望与世界各国教育开展更为广泛交流的强烈意愿,同时也表明,中国教育对自身的责任和担当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教育强国”这幅未来图景蕴含着世界教育这一深刻的背景。

二 “教育强国”的理论内涵

^①文中凡是未注明的引用皆出自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理解“教育强国”的理论内涵,宜将其置于具体的任务和事项,即作为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方略来进行诠释。结合十九大报告,似可从四个方面分析“教育强国”的理论内涵。

其一,倡公平而有质量。“公平”是十九大报告的重要主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我党新时代的重大任务。“公平”的理念清晰地落实在教育事业的谋划与发展上,体现在“教育强国”的内涵之中。从地域均衡发展而言,“公平”体现在“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从教育制度优化发展而言,“公平”体现在“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实现各级各类教育优化发展;从本质特性而言,“公平”不是平庸,并非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发展,相反,“公平”与“质量”是紧密联系的,失去“质量”的公平是没有意义的,十九大报告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其在教育公平和质量追求的具体表述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其二,强内涵而有影响。十九大报告注重推动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念俯拾可见,几乎每一阶段、每种类型的教育都有所体现。内涵式发展,总体上强调“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体到各阶段各类型的教育表述则各有不同,要么“高度重视”,要么“完善深化”,要么“加快建设”,不一而足。其中,“教育强国”注重内涵式发展更为鲜明地表现在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的政策表述上。简要分析可知,“一流”是通过横向比较而得到的自身状态水平的定位,与“教育强国”的涵义十分契合,共同表达出我国教育渴望得到世界承认的强烈愿望。要实现这一愿望,我国教育必须积极与世界教育开展对话,并在对话中发挥自身的影响。有效的对话是两个“异质”主体之间的思想交流,我国教育要实现与世界教育对话必然不能亦步亦趋地模仿其他国家教育的发展模式,反之,我们只有形成不同于别国的独特个性,建构起傲立于西方的独立“自我”,才有影响“他人”的基础,才能真正成为“教育强国”。

其三,扩外延而重民生。“教育强国”之“强”既表现在“内涵式发展”上,也突出地显现为外延的丰富上。从十九大报告对于新时代教育的部署来看,教育的“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不限于教育制度中常见的教育组织机构类型,提出了“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以及“网络教育”;不限于国家财政投入的教育类型,提出要“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不限于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校教育,提出要重视完善“培训体系”,“办好继续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根据这一部署,“教育强国”之“教育”完全超出了国家建设“工具”这一价值范畴,教育的价值取向更多地转至个人发展。国家并不根据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来安排与设计教育,因此短期难见效益的“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得到了重视。在“教育强国”之中,教育是事关“现实利益”、“幸福感”、“获得感”的一个“民生”问题,其根本目的在于“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可以认为,正是关注“个体”的价值取向使教育成为我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事业。

其四,重教师而有保障。教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前提,打造一支具有良好“师德师风”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过去五年,我国在“健全大中小学师德体系”、“制定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专门政策,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中小学设置正高级职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成绩骄人,教师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积极性高涨^①。在短时间内,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便能实现如此迅速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究其缘由,国家宏观政策对教师发展的规划和引领或是其重要推动力量。由此可进一步推论,“教育强国”应从过去仅注重教师自主发展转向到为其创设快速发展的宏观政策轨道。以往一味要求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撰写教学日志等,在缺乏宏观政策刺激和保障的情况下,这样的发展路径只能使教师身心俱疲,最终失去专业发展的信心。“教育强国”中的教师发展以国家政策为基础,经费支持与专业激励都将大为改观。

三 “教育强国”的现实路径

如何确立现实路径?路径与目标是一对可相互参照、相互诠释的范畴。所谓现实路径,即达到某种目标

^①陈宝生《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9页。

的具体可行的道路,由于目标本身是可以分解的,有近期、中期、远期之别,不同阶段的目标便成为构造路径的“标点”。根据这一分析,似又可将路径理解为远近不同的目标,是一系列目标串联起来而形成的道路。要言之,路径是目标的展开,目标是路径的本质;路径无不是根据目标而确立的,欲问现实路径宜先考未来目标^①。那么,何为“教育强国”的未来目标?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因此从“民族复兴”这一未来目标可以理解“教育强国”的现实路径。似可认为,“教育强国”既以“民族复兴”为目的,则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建设“教育强国”的知识基础也必然立足于我国教育文化、立足于真实的教育情境而生发出来,此外,“民族复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背景,因此为世界提供中国教育方案也必然是“教育强国”现实路径中应有的“标点”。

先论“教育强国”的文化根基。建设“教育强国”旨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决定了其必然深具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建设的“教育强国”,不是以西方教育的标准来衡量的“强国”,但也不是与西方教育毫无关系的“强国”。之所以不能以西方教育的标准来衡量,是因为教育强国从课程内容到教学方式再到教育目的,无不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西方教育的标准很难对其加以裁量。与此同时,“教育强国”并不是与西方教育毫无关系,其“强”完全体现在能够独立与西方教育进行对话,能够对其产生影响。显然,这两方面,即“教育强国”的中国文化根基及其对西方教育产生影响,是紧密相关的。具有中国文化的根基,我们的教育强国才是独树一帜的,才有与其他国家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才能影响其他国家,从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强国。这就要求我们建设“教育强国”,不要盲目地搬移其他国家的教育模式,而应立足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由此生发出具有民族风格、民族特色的教育。

再谈“教育强国”的知识基础。任何教育实践都有其知识基础,仅分析实践的特性而不考察其知识基础,仍不能对其深入理解,更无法解构其现实路径。我们认为,支撑“教育强国”的知识基础不能是别国的教育理论,那种热衷于翻译西方教育论著,以其马首是瞻的教育知识生产方式并不能获得“教育强国”的知识基础。同样,以哲学、社会学等其他成熟学科为基础生产教育知识,由于脱离真实的教育情境,也注定无法成为“教育强国”的知识基础。不同于这两种生产方式,“教育强国”知识基础的建构似应返回我国教育经典文献,梳爬中国教育知识传统。不过,与现代完全割裂的“传统”是一堆死去的文献,还不能为“教育强国”奠定知识基础,只有利用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经验以及现代教育学术资源对其进行理解、诠释,才能激活教育知识传统。激活的教育知识传统融于教育知识生产便可产生出具有民族气派的中国教育学,这种教育学为人类认识教育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我们对话与批判西方教育理论提供了可能,可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知识基础。

最后简析“教育强国”的中国方案。我党既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教育强国”之“强”便不可能是倚强凌弱之“强”,我们无须通过对“弱”的排挤、打压来体现自身的“强”。如果说“教育强国”并不意味着让周边发展中国家感受到威胁,不意向其他国家炫耀自身力量,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建设“教育强国”将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什么?意味着什么?根据十九大报告的明确表述,建设“教育强国”,将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教育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教育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在此,一个颇值得关注的事件是,2017年上海数学教材被英国引进,英国部分小学已陆续使用上海一至六年级数学课本、课本练习部分和教师用书。似可认为,我国的教育方案已得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承认,“教育强国”气象已初步显现。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①雷云《教育知识的社会镜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